

百年中的难题、主潮、多元探求、智慧与失误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20th Century



第一卷 西方思潮（上）

王鍾陵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百年中的难题、主潮、多元探求、智慧与失误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20th Century

第一卷 西方思潮（上）

王鍾陵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百年中的难题、主潮、多元探求、智慧与失误：六卷本/
王鍾陵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211-06897-5

I. ①二… II. ①王… III. ①文学思想史—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20 世纪
IV. ①I209 ②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7776 号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六卷本)

ERSHI SHIJI ZHONGXI WENLUN SHI

——百年中的难题、主潮、多元探求、智慧与失误

作 者：王鍾陵

责任编辑：林 彬 王金团

整体设计：陈培亮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福飞路义井村古东工业区

邮政编码：350001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19.25

插 页：4

字 数：4501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6897-5

定 价：650.00 元（全六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王鍾陵 1997 年 11 月摄于香港中文大学

编者按：

文论史，是一门研究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发生作用的理论、主张、观念之变迁的学科。它与文学史既相融合，复又有其自身的渊源、沿承、演化及其在思想资料上的独立性。王鍾陵教授所著《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是一部篇幅达四百五十万字的世纪性总结的著作。在国外，与此书同类的著作只有二部：一部是丹麦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0万字），一部是美国人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330万字）。王著不仅在篇幅上远超这两部书，而且在研究的范围上也有了明显的拓展：电影、电视及京剧，还有西方哲学都被纳入到论述中，从而使得这部文论史，成为了第一部门类完备的文艺理论史著作，并大大加深了对西方文论论述的深度。更重要的是，王鍾陵教授还在研究方法上大力创新，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意在创造，是他这部书的鲜明特色。王著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当代学者，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创造新学术的文化自信。

为了完成这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篇幅最大的个人著作，王鍾陵先生费去整整15年的艰辛努力。由于积劳成疾，王鍾陵教授于交稿后即住进医院。一场切去左肾的大手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手术后身体极度虚弱，打针治疗反应强烈的情况下，他又立即开始改校样，每天工作十多小时。

本刊摘要发表《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前言，以飨读者。并以这样的方式向王先生的学问人生致以由衷的敬意。

（原刊《光明日报》2014年5月20日第16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家印象”专栏



王鍾陵：惟精惟勤 务远务大

◎本报记者 王广博

“近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王鍾陵的《论神话思维的特征》……我想到一个问题：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在1992年3月23日写给其弟子戴波的信中，时年81岁的钱玄森先生曾如是说。

信中提到的王鍾陵，当时49岁。王鍾陵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在国内最早开始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与转型，将研究与创作并举，涉及古今中外文学以至哲学、历史等众多领域。

构建文学史革新理论体系

原创文学及文学批评是王鍾陵的研究重点。谈及当时状况，他表示：“开始进行原创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一股向前走向革新的冲动，但路在何方尚不清楚。方法热第一时兴起，却没有实绩。”那时整体古代文学研究处于想突破却无法突破的状态中。

王鍾陵从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

探究入手，构建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他先后完成了《中国中古诗学史》、《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文学史新方法》三部代表性著作。王鍾陵说，“三部曲，构成了我的文学史革新的完整理论—实践体系。”

王鍾陵在《中国中古诗学史》“前言”部分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集中探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有机联系的新研究方法；在民族思维发展的基础上，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动态建构过程上来把握文学史的逻辑，将文学史研究纳入文学史研究中，将美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等。《文学史新方法》则在文学史论史上，第一次对文学史的理论问题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论述。在《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王鍾陵提出了一种新发现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此著的文化—心理研究和神话思维的深入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十五年完成《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文学史革新是王鍾陵学术研究的

第一阶段，1993年秋季至1996年，王鍾陵集中精力研究《庄子》，而在随后的十五年——1997年1月到2012年5月中，王鍾陵将全部精力放在了《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写作上。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总篇幅达450万字，王鍾陵为完成这一著作，持续写作15年，坚持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这种艰辛努力，使他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甚至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曾有关心我的朋友以为这样拼命不值得，但我知道，要完成一项大的工程，是必须有着献身精神的。”

谈到写作《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的原因，王鍾陵表示，“在西方，20世纪种种文论流派此起彼伏，错综交织，相生相克，西方学界自己往往也未能清晰地理清其关系。我的目的之一，便是要表明中国人有能力理解并消化西方文论，有能力理清这种种流派间的复杂关系。”促使王鍾陵坚持下来的动力还包括超越国外同类著作，建立一个新文艺理论体系的重望。同时，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敦促王鍾陵不断向前，“此前三部著作的成功，给了我信心，

也给了我压力。这部著作的写作便是我试图超越自我的实践。”王鍾陵表示，将一个世纪综合起来，才能将其整体性的模式概括出来，进而厘清各种文论由于其内在本体的差异而在同一模式下呈现出的不同发展轨迹。

“课题的难度巨大，但优势也明显。”王鍾陵表示，将一个世纪综合起来，才能将其整体性的模式概括出来，进而厘清各种文论由于其内在本体的差异而在同一模式下呈现出的不同发展轨迹。

将《庄子》研究作为又一次冒险

“榛荆放牧，还要靠宽阔大，才能有气象万千的雄伟建筑群矗立在地平线上。”王鍾陵将“雄赳赳，气昂昂”八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认为，做学问要在精的基础上求大，惟精才能有真正的大，惟大才能更精。

“学术研究如美木参天然然隐在了时代的鼓点上，可能是幸运的，但更要记住，学术研究，特别人文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属于民族的，要将自己的研究融合到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总和中，学术研究的世界价值，是从民族价值中生长出来的。”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王鍾陵时时以这种使命感激励自己。

王鍾陵对古籍研究或说文学研究的创新也有自己的观点。“比如《老子》、《庄子》、《诗经》、《楚辞》、《尚书》、《左传》这些中国文化的奠基性典籍，我们至今还处于不能读懂，或不能深入理解的境地。其中特别是《庄子》的难度是最大的。”王鍾陵正是以《庄子》研究作为对国学研究创新的实践。他表示，要完成全书，前路相当艰难崎岖，还得做很重的努力。“这是我的又一次冒险进军，迎难而上。”



王鍾陵：惟精惟勤 务远务大

“近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期王鍾陵的《论神话思维的特征》……我想到一个问题：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在1992年3月23日写给其弟子戴汝为的信中，时年81岁的钱学森先生曾如是说。

信中提到的王鍾陵，当时49岁。王鍾陵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在国内最早开始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与转型，将研究与创作并举，涉及古今中外文学以至哲学、历史等众多领域。

构建文学史革新理论体系

唐前文学及文学批评是王鍾陵的研究重点。谈及当时状况，他表示，“开始进行唐前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一股向前走即革新的冲动，但路在何方尚不清楚。方法热虽一时腾起，却没有实绩。”那时整体古代文学研究处于想突破却无法突破的状态中。

王鍾陵从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探究入手，构建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他先后完成了《中国中古诗歌史》、《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文学史新方法论》三部代表性著作。王鍾陵说，“三部书，构成了我的文学史革新的完整理论与实践体系。”

王鍾陵在《中国中古诗歌史》“前言”部分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集中探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有机联系的新研究方法：在民族思维发展的基础上、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动态建构过程上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将文论史研究纳入文学史研究中，将美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等。《文学史新方法论》则在中外文论史上，第一次对文学史的巨系统运动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论述。在《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王鍾陵提出了一种新发展观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此著的文化—心理研究和对神话思维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十五年完成《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文学史革新是王鍾陵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1993年秋季至1996年，王鍾陵集中精力研究《庄子》。而在随后的十五年——1997年1月到2012年5月中，王鍾陵将全部精力放在了《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写作上。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总篇幅达450万字。王鍾陵为完成这一著作，持续写作15年、

坚持每天工作 12—14 个小时。这种艰辛努力，使他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甚至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曾有关心我的朋友以为这样拼命不值得，但我知道，要完成一项大的工程，是必须有献身精神的。”

谈到写作《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的原因，王鍾陵表示，“在西方，20 世纪种种文论流派此起彼伏、错综交织、相生相克，西方学界自己往往也未能清晰地理清其关系。我的目的之一，便是要表明中国人有能力理解并消化西方文论，有能力理清这种种流派间的复杂关系。”促使王鍾陵坚持下来的动力还包括超越国外同类著作、建立一个新文艺理论体系的愿望。同时，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敦促着王鍾陵不断向前，“此前三部著作的成功，给了我信心，也给了我压力，这部书的写作便是我试图超越自我的实践”。

心愿归心愿，做起来却极为艰难。《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的研究目标要求将哲学与社会思潮、各种文体以及各种文艺类别都囊括在内，阅读量、工作量极为庞杂。

“课题的困难巨大，但优势也明显。”王鍾陵表示，将一个世纪综合起来，才能够将其整体性的模式概括出来，进而厘清各种文体由于其内在本体的差异而在同一模式下呈现出的不同发展轨迹。

将《庄子》研究作为又一次冒险

“楼台精致，还要堂庑阔大，才能有气象万千的雄伟建筑群矗立在地平线上。”王鍾陵将“惟精惟勤，务远务大”八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认为，做学问要在精的基础上求大，惟精才能有真正的大，惟大才能更精。

“学术研究如果不期然地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可能是幸运的。但是要记住，学术研究，特别人文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属于民族的，要将自己的研究融合到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学术研究的世界价值，是从民族价值中生发出来的。”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王鍾陵时时以这种使命感鞭策自己。“我们民族文化的新构自‘五四’以来就开始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一新构在新时期又重新启动。”他表示，文学领域的新构一是文学史研究革新，二是文论史研究革新。致力于完成这两项研究的创新，是为了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王鍾陵对古籍研究或说国学研究的创新也有自己的观点。“比如《老子》、《庄子》、《诗经》、《楚辞》、《尚书》、《左传》这些中国文化的奠基性典籍，我们至今还处于或不能读懂、或不能深入理解的境地。其中特别是《庄子》的难度是最大的。”王鍾陵正以《庄子》研究作为对国学研究创新的实践。他表示，要完成全书，前路相当艰难崎岖，还得做艰辛的努力。“这是我的又一次冒险进军，迎难而上。”

（照片及题词原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9 月 15 日第 1 版，报道刊其第 2 版）

前言

1900年，44岁的弗洛伊德出版了对于他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具有奠基石意义的著作《梦的解析》，这是西方学术思想在世纪之交获得新质的显著标志。

然而，这其实乃是蛰草的萌蘖，西方哲学的转折早在十九世纪上半个世纪中，就已经不无艰难地开始了。比之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初版发行600本，却经过8年才卖完，前两个星期中只卖掉100多本的命运更加悲惨的是，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初版（1819），在一年半中只卖掉140本，其余全部报废。尼采曾带着同情的赞美这样描写叔本华的窘状：“那两眼冷酷，全身武装的骑士，和他那苍白得可怕的同伴，毫不气馁地在那可怕的道上奔驰着，没有希望，跟着他的只是那马与狗。这个武士便是我们的叔本华，虽然没有希望，但仍坚持地要寻找真理”^①。

叔本华的哲学既不从客体出发，也不从主体的思维出发，而是从表象出发。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开卷的第一句话“世界是我的表象”^②，是他的哲学起点。与“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命题相对的是另一个命题：世界是我的意志^③，则是他的哲学

①〔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李长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57页。

②〔德〕阿图尔·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第1版，第25页。此书正文有一、二、三版序，序与正文的页码连排。引者按。

③在第19节中，叔本华说：“如果说物体世界除了只是我们的表象以外，还应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它除了是表象而外，也就是在它自在的本身，在它最内在的本质，又是我们在自己身上直接发现为意志的东西。”（《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58页）在第29节中，叔本华又两次说：“我们生活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按其全部本质说，彻头彻尾是意志，同时又彻头彻尾是表象”。“世界和人自己一样，彻头彻尾是意志，又彻头彻尾是表象，此外再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同上书第233页）。作者按。

的核心。意志，即是他所说的自在之物^①，意志的直接客体化是理念，意志的间接客体化为事物^②。直觉，是达到自在之物的途径^③。而世界是无，则为他的哲学的终点^④。显然，他的学说显示了与理性、逻辑及与之相联系的乐观主义不同的另一个哲学方向。叔本华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曾选择与黑格尔同一时间授课，企图与黑格尔争夺影响，但是遭到惨败，据说听众从未超过三人。然而，1848年革命失败后，社会心理有了巨大的变化。叔本华于1851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附录和补充》，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叔本华热”竟很快席卷了德国知识界。

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明显转换了方向。黑格尔在他死后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抛弃了，他的学派解体了。十七、十八世纪英、法唯物主义及费尔巴哈哲学被冷落。继叔本

① 在第21节中，叔本华说：“现象就叫作表象，再不是别的什么。一切表象，不管是哪一类，一切客体，都是现象。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64~165页）在第24节中，叔本华又反过来说：“自在之物是什么呢？就是——意志”（同上书第177页）。作者按。

② 在第25节中，叔本华说：“如果这自在之物就是意志，——我相信这是我已充分证明了，弄明白了的——那么，意志作为意志并和它的现象分开来看，就站在时间和空间之外了，……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杂多性全部是意志的客体性”。“‘意志客体化’的这些级别不是别的，而就是柏拉图的那些理念。”“我对理念的体会是：理念就是意志的客体化每一固定不变的级别，只要意志是自在之物，因而不与杂多性相涉的话。而这些级别对个别事物的关系就等于级别是事物的永恒形式或标准模式。”（同上书第188、190、191页）在第28节中，叔本华又说：“意志自身，作为自在之物，却并不包括在这种杂多性和变换之中。理念（柏拉图的）的差别，也即是客体化的各个级别；一大群的个体，每一理念都把自己表出于这些个体中”（同上书第221页）。作者按。

③ 在第34节中，叔本华说：“不是让抽象的思维、理性的概念盘踞着意识，而代替这一切的却是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献给直观，浸沉于直观”，“人在这时，……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象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所以，客体如果是以这种方式走出了它对自身以外任何事物的一切关系，主体〔也〕摆脱了对意志的一切关系，那么，这所认识的就不再是如此这般的个别事物，而是理念，是永恒的形式，是意志在这一级别上的直接客体性”。“主体，当它完全浸沉于被直观的对象时，也就成为这对象的自身了，因为这时整个意识已只是对象的最鲜明的写照而不再是别的什么了。正是这个意识，在人们通过它而从头至尾依次想到所有一切的理念或意志的客体性的级别时，才真正构成作为表象的世界。”（同上书第249、250、251页）作者按。

④ 在第71节，叔本华说：“我们既然认为世界的本质自身是意志，既然在世界的一切现象中只看到意志的客体性，……随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都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于是留在我们之前的，怎么说也只是那个无了。”（同上书第562页）作者按。

华的生命意志论，尼采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进一步提出了权力意志论，并呼唤象征了强烈的欲望与野性的冲动的狄奥尼索斯之鸟的鸣叫，向往着梦幻与狂醉合一的希腊悲剧精神的复兴。在其《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远溯他称之为“整个西方文明之漩涡及转折点”^①的苏格拉底，以清算理性主义传统。他说：“康德与叔本华之超群绝伦的勇气与智慧已经赢得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胜利，一向支持着我们的文化之基础的逻辑的乐观主义的根据至此便被攻克了。”^②他解释说，近代的乐观主义将宇宙认定为是可探知的，并假定了永恒真理之存在以及空间、时间与因果律之绝对性与普适性；而康德则认为，这些定律或原则只不过是指出一些表象以代表真实的实在的地位，因此是不可能给予那“实在”以真正的了解的。尼采认为，由于世界认识的确实性之被否定，也因为明白了撒开在整个地球上的知识之网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如果被加以了利己主义的应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毁灭性的宇宙战争将爆发，因此，“苏格拉底式的文化已经从其两边被振动起来了，并开始怀疑到它自己的绝对可靠性”^③。

叔本华及尼采的哲学，不仅直接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所继承，而且也还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先源。弗洛伊德承认说：“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偶合”，“他不仅宣称情绪的支配作用和性欲的极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识到了压抑机制”^④。

理智遭到贬损，盲目的力得到歌颂。非理性的生命流，力图从理性的坚硬的外壳中冲溢而出。

在文艺上，十九世纪中叶，也躁动着一股新的力量。《恶之花》（1857）的作者夏尔·波德莱尔已在告别理性时代。1845年左右登上文坛的波德莱尔，感受到一股坟墓的味儿在黑暗中飘荡，他以幽冷怪诞的笔触写出噩梦般的诗句，意在透过粉饰，掘出地狱，暴露那个大白天幽灵就拉扯行人的社会之丑恶、荒芜、阴郁。对于这本在浪漫主义夕阳中开放的《恶之花》，波德莱尔自白道，这是“一本表现精神在恶中骚动的书”^⑤。这是一本残酷的书，其中有温情，也有仇恨。波德莱尔的影响在魏尔伦、马拉美、韩波身上，都表现得十分深刻。

人的非理性的心理深渊，愈益成为许多西方文学家所尽力加以表现的对象。作为十八世纪

① 《悲剧的诞生》第118页。

② 同上书第140页。

③ 同上书第141页。

④ 《弗洛伊德自传》，张霁明、卓如飞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82页。

⑤ 《波德莱尔全集》第1卷第195页，引自《恶之花》，郭宏安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86页。此书分为两个部分：《论〈恶之花〉（代译序）》及《恶之花》，两部分页码分别排列。引者按。

“生命的太阳”、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①，不可逆转地式微了。

二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却在走着另一条路。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使人们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呼吸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鲜空气。对于盛行占卜、扶乩、烧纸钱，相信六道轮回，将祭天列为国家大典的社会来说，理性思想不仅不过时，恰恰正是应该升起并愈益辉煌光华的生命的太阳。于是“德”“赛”二先生乃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

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都在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文学运动的汹涌急流中投下过斑驳的色彩。叔本华的影响，使得王国维于1904年写下了以解脱为旨归、着力强调《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的《〈红楼梦〉评论》。弗洛伊德的影响在鲁迅身上，表现为《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②，并以此“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③，

① [法] 米涅《法国革命史》载曰：“路易十六之死使各党派更加无法调和，同时增加了革命的外部敌人。共和派一方面要同欧洲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对付许多反对阶级和自身的党派中的人。领导群众运动的山岳党自认为早已下定决心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丹东以及把丹东看作自己的领袖的山岳党的计划是：对革命的敌人实行恐怖，对人民则通过讲演来宣传当前的危机和发动暴动，以激起他们的狂热，使他们关心政府和共和国的存亡，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向群众灌输最强烈的热情；保持准备应付危机的警惕状态，以便利用群众的激昂情绪和力量。”（北京编译社译，郑福熙校，商务印书馆1977年9月第1版，第177页）“每当委员会的报告人发言，都可以听到这一派人的神圣言词；在圣茹斯特和罗伯斯比尔的演说中，尤其是这样。共和国的政治是自由和平等；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和国所要维护和保全的是国家的生存。共和国的宗旨是道德；共和国的信仰是最高主宰；至于公民方面，彼此间的一般关系是博爱，他们的德行是诚实，是思想的纯正，社会活动的安分守己，是有利于国家而不是有利于个人；所有这些，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信条。”（同上书第232页）“每一个时期，人们都曾坚决地拥护过某种观念：起初是拥护自由和君主立宪；以后是拥护平等、博爱、共和。但在督政府成立的时候，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了”（同上书第294页）。[法] 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亦载曰：“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唤起了民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者’；……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战争，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相反地，君主和贵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平等联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上卷，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端木正校，商务印书馆1978年10月第1版，第24页）作者按。

②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513页。以下凡引自《鲁迅全集》1981年版者，均不再注明版本，只注卷数及页码。引者按。

③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41页。

鲁迅还明白表示,《不周山》“取了弗罗特说”^①。郭沫若自称“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者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必定可以从他的小说《残春》中,“看出一种作意”。《残春》所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②。他又说:“我在《残春》中做了一个梦,那梦便是《残春》中的顶点,便是全篇的中心点,便是全篇的结穴处。”^③

但是,作为“五四”时期思想界领袖的陈独秀,他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其目的则在拖四十二生之大炮,轰炸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以为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之前驱;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④,才是建设新文学所必须加以讨伐的大敌。

虽然中国各体文学几乎都承受了西方思潮的强烈影响,甚至长时期地邯郸学步于西方之后,并由此形成了许多文学流派,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潮流,毕竟是在自己特定的河床中流向前方的。西方影响是刺激中国现代文体产生的动力,但现代文体的生根、抽芽,既然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那末它就必然既受到这里的阳光雨露之滋育,同时也一并领受其狂风暴雨的摧残。母体的凭藉与新知的借鉴,造成了差异众多的治学的、艺术的取向。于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乃在痛苦中扭曲着前行,各体文学都有过一度或长或短的、或大或小的光耀的以至辉煌的时期,但也都有着长时期的黯然神伤。

中国文学在走向西方的现实主义,强调救世。越过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⑤,不仅成为新一代文学家,而且也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走向。文艺在这一走向中,光大了,新文学运动蓬蓬勃勃地蔚成了大观;但它也被紧紧地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文学批评更是成为奴婢的奴婢。经由进化论模式、社会学模式及其政治化与庸俗化,当新时期来到时,奴婢增强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于是,一股文学史新潮,乃锐不可当地崛起了。

三

与背离理性相伴的,是主体性的被消解,社会非理性与世界荒谬性的被认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学术在对社会、人生的进一步清醒中,却深浸着颓唐和无奈。一个耐人寻味

①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41页。“弗罗特”,通译弗洛伊德。引者按。

② 《批评与梦》,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36页。

③ 《批评与梦》,同上书第238页。

④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⑤ 同上。

的事实是,西方不断传出了死亡的宣称。1883年,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宣布“上帝死了”^①;1966年,福柯在《词与物》中宣言:人“正在死亡”,“正接近其终点”^②。1969年,福柯又作了关于“作者之死”的演讲。距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百年,即到二十世纪末叶,利奥塔终于以《知识分子的坟墓》,唱响了这一死亡进程的最后的挽歌。他说:“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更像是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家认同于被赋予了普遍价值的一个主体,以便从这一观点来描述和分析一种情形或状况,并指出应该做什么,使这一主体能够实现自我,或至少使它在自我实现上有所进展。”“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了,如果还有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对自18世纪以来西方历史上的这一新事实视而不见:在现实中已不再出现普遍的主体—受害者,让思想能够以它的名义提出一种同时是‘世界的构想’(寻找名字)的控诉。”^③利奥塔的意思是,后现代瓦解了整体化的统一性、普遍性,普遍性思想的衰退使得以普遍价值为思考方向的知识分子不再存在了。原型、本文、结构这一些非主体化的概念,雄踞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终于,世纪末叶,早期着力消解主体的福柯,在其最后出版的《性经验史》的二、三两卷中,却又转向了“主体”问题,新历史主义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主体性是文化建构起来的观点。

中国文学旨在完成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建立现代文体,建立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史研究之新形态,在确定规范的过程中,步履维艰而曲折多难地走在移用、挪借的道路上。历史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涨落于国门之关与开的旋转中。

当西潮东渐,学人们在脸上的菜色有所消退、变得丰盈一些时,则又往往陷入到一种时差的尴尬之中。也就是说,当某一被引进的方法,在中国被一些学人津津乐道时,它在西方早已度过了它的兴盛期,甚至其缺点也已经迭遭批评了。如果仅仅是从思路的角度去借鉴还好办些,过于贴近去作摹仿,就难免辽东豕之讥了。应加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对于开拓我们的眼界、更新文学史研究的路径,都起到了显著的有益作用。但毋庸讳言,食西不化、崇洋迷外的倾向也已显著抬头,不仅存在着过分颂扬西方文论的偏向,而且此种颂扬还仅止于介绍和转述的浅表状态,相当多的论者半懂不懂甚至是完全错误地在谈论或引用西方文论,以自误误人地增强自己著作的所谓“理论性”。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在许多人的眼中黯然了。虽然也还有人因为置办不了一

①〔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6页。

②〔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第504、506页。

③〔法〕利奥塔:《知识分子的坟墓》,《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第116、121页。此文原收入《知识的与其他的文本的坟墓》(巴黎,1984)。引者按。

套西服、学不会系领带，而愿意终生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在任何时代，学术生态圈中的群落都是多向度地分布的。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我们对于西方批评方法产生的背景有着相当的隔膜，因而对于某一学派理论的复杂性以及学派之间纵横交织的生发、影响关系也往往缺乏理解，又由于摆脱学科落后状态的追求十分迫切，于是便大量产生接触到一些“新”的概念和命题就匆忙加以运用的情况。然而，表面的花俏，难以掩盖内在的贫血；一时的自我陶醉，更难经受历史的沙汰。

举例来说，新时期以来，荣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十分明显，他的主要概念“集体无意识”与“原型”渗透进了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前一概念，更是成为了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文学史、哲学史、社会学、民俗学等众多领域都加以采用的基础性概念，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这一概念有可能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化—学术建构的框架性概念。然而，十分遗憾的是，甚少有人对这两个概念在荣格理论中的真实含义及其正确性作认真的探讨。其实，不仅是对荣格，在长期的思想饥渴以后，我们对于东渐的西潮有一种迫不及待加以吸收的需要，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流派都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批评派的诗学理论，不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中国新诗》杂志为中心集合起来的一批诗人及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及评论中，曾一再发生过明显的影响；而且，它的一套术语，也被一些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所使用；它的细读法，古代文学研究界中也有人取之为路径。

其实，也不仅是由于对西方学术思想的隔膜及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本身纵横交织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一时难以对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理论及概念有一个真切的认识；即使是国外的有关研究，往往也未能抓准许多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得失，因而鲜见有不浮泛的解说，更鲜见有高屋建瓴的、深层次的批判。

十分明显，一些错误或有缺陷的概念、方法之被含糊运用，必将造成理论的混乱。更进一步说，我们如不能正面对西方哲学与文论思潮作出评论，分清其利弊，审查其概念及方法，站到一个更高的基点上去，则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研究及中国文学与哲学理论的民族品格的取得就做不到，这样，人文领域里中国学术的独立也将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化—学术的新的构建，虽然必然地要引进国外新的理论和概念，却不能以一种不明庐山真面目的态度来加以采用。对于新时期以来进入我国的西方学术理论及其概念，加以认真地别择，无疑是建设我国新的文化、学术体系的前提。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的文明古国，在一个新的时代，既应该有一种大力包容异质文化的气魄，也应该有一种能够在深入、透彻理解基础上对之加以别择和改造的智慧。

在吸收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上，我们应该以一种大的气魄，求一种大的智慧，并以此种大的智慧，去展拓一种吞涌江海的更大的胸怀。这种大的智慧，不仅要求有诸如概

念的识别、理论框架的把握、学派关系的梳理这些深入到西方批评方法内部的认识，而且还需要别具只眼地、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基点上，抉示其在思维方法与实际的文学史研究中的得与失。然而，要达到这样一种高度，则既需要有建立在文学史写作实际经验上的对于文学史运动的整体性的新颖理解，又需要有善于作深刻剖析与宏观概括的理论能力及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没有丰富而独到的文学史研究的实际经验和相关领域的深刻理论以及高超的理论能力这三项依凭，要想高屋建瓴地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加以统摄改造，是只能徒兴望洋之叹的。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发展，不知从何着手，古代文论的研究存在着脱离现代需要的书斋式倾向。对于二十世纪新文学运动中各种文体创作中所积累的新鲜经验，缺少一种气魄更大、层次更深的总结：多年来，文艺界未能从一个时代创作与理论模式之兴起、发展与衰亡的角度，未能更为自觉地紧扣现代文体的建立过程，并以文体的分化、浮沉及类型转换的浑化的发展观，以几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争锋及汇融、以雅和俗的悬隔与汇通的整体视野，从各文体的内在矛盾出发，来研究和总结一个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践及理论。

对于西方文论之雾中看花、缺少消化；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不能作出现代阐述，从而丰富更新之；对于新鲜的文艺经验，缺少深入到模式和本体上的总结，对新文学运动也不能有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通贯的整体性理解：这样几个方面的状况，使得我们建立既具有现代形态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工作，举步维艰。十分清楚，与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深入对话，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价值的现代认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只有在对西方文论得失的深刻的梳理剖析及与中国文论扎实而眼光高卓的比较中，并在对新的文艺创作及文学史研究的实践经验加以理论概括的基础上，才能克服中西文论各自的缺点，取其所长，汇通之，而又提高之。如是，我们对文学理论中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才能获得一种以世界性眼光为基础的更高的认识。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也才能有实质性的重要进展。

四

我对于这部书，有三项目标：一是希望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领域中，创立一种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上有别于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世纪性总结的著作体例；二是在我从事过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后，继而从事于文论史研究方法的革新；三是在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文论都作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凭藉我本人以前对于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实际研究，对于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研究，对于原始意识、